

魏源《诗古微》门户之见探微

曹志敏

(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天津 300387)

【内容摘要】魏源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经学家,学术界通常认为魏源《诗古微》主三家《诗》而斥《毛诗》不遗余力,使晚清今文经学的壁垒渐立,但本文通过考察认为,魏源虽然为三家《诗》辩护,认为《毛诗》传授源流不可信,《毛序》非子夏所作,但仍能以公允的态度肯定《毛诗》的优点,批评三家《诗》的缺陷,认为三家《诗》是《毛诗》的益友,在《毛诗》与三家《诗》的问题上,魏源没有门户之见,本文对《诗古微》的门户之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。

【关键词】魏源 《毛诗》 三家《诗》 门户之见

中图分类号 I206.2

文献标识码 A

文章编号 1007-9106(2010)10-0105-04

魏源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经学家,在清代今文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,而其所著《诗古微》是阐发三家《诗》微言大义的一部重要著作。清末民国的学者,大多认为《诗古微》专主三家《诗》而大力排斥《毛诗》,最为典型的是梁启超,他说:“魏源《诗》主齐、鲁、韩,……而排斥毛、郑不遗余力。”^[1]此论可谓抓住了《诗古微》的主要学术倾向,在学术界颇为普遍。但梁氏又说:“《诗古微》不特反对《毛序》,而且根本反对《毛传》,说全是伪作。”^[2]这一说法则站不住脚。陈其泰先生《清代公羊学》虽然对梁氏论点进行了辨正,可惜没有全面具体论述魏源对《毛诗》与三家诗的态度。建国后学术界对魏源思想的研究,可谓成果浩繁,但是对《诗古微》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,因此对魏源《诗古微》古今汉宋的门户观念依旧模糊不清。笔者通过对魏源《诗古微》的研究,认为魏源虽然为三家《诗》辩护,大力彰显三家《诗》说确实可信,澄清历代诗家对三家《诗》之诬,且认为《毛诗》传授源流不可信,《毛序》非子夏所作,但仍能以公允的态度肯定《毛诗》的优点,批评三家《诗》的缺陷,认为三家《诗》是《毛诗》的益友,在《毛诗》与三家《诗》的问题上,没有门户之见。

一、彰显三家《诗》说确实可信,澄清历代诗家对三家《诗》之诬

魏源是晚清著名的思想家,也是今文经学的健将,其所著《诗古微》二卷(初刻本)约在1829年前完成,著名学者李兆洛、刘逢禄曾为之作序,盛赞《诗古微》张大三家《诗》筌路蓝缕的开创精神,在此后十余年时间里,魏源继续进行修改撰述,直到1840年《诗古微》二十卷(二刻本)刊行。魏源生活的嘉道时期,是清代学术发生转向的重要时期,乾嘉汉学由盛而衰,今文经学异军突起,表现在《诗经》研究上,就是大规模搜集采择三家《诗》遗说。西汉《诗经》研究分为齐、鲁、韩今文三家与古文《毛诗》,汉魏时期三家《诗》就已经亡佚,《毛诗》千年独传。在清代,经过学者范家相、徐璈、臧庸、

陈乔枏等人的辑佚整理,三家《诗》说复现于世,但大多数人停留在考订异文的层面上,而对其微言大义的阐发较少,在今文经学复盛的学术大潮中,魏源《诗古微》堪称是阐发三家诗微言大义的一部重要著作。

由于三家《诗》早已亡佚,《毛诗》千年以来取得了诗经学史上的一尊地位,因此诸多诗经学者对三家《诗》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。要想确立三家《诗》的地位,张大其旗帜,就必须澄清这些误解。魏源把历代诗家对三家《诗》的错误认识,总结为三点:“其矫诬三家者,不过三端,曰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》皆未见古序也,《毛诗》与经传诸子合而三家无证也;《毛序》出子夏、孟、荀而三家无考也。”^[3]在古文经学家看来,三家《诗》未见古序,与经传诸子不合,传授无考,而这三点恰恰是《毛诗》优于三家诗的地方。对于这些论调,魏源一一进行了驳正,在他看来,三家《诗》也都有序,这一点与《毛诗》相同,在是否与先秦典籍相合、《诗序》作者这两个方面,魏源的观点与古文家恰恰相反。

首先,在诗序问题上,魏源根据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“《韩诗》二卷,卜商《序》,韩婴《传》”的记载,认为韩诗有序,且出自子夏。从历代学者对《韩诗序》的称引中,可以看出《韩诗序》“皆与《毛诗》首语一例”,刘向属于《鲁诗》学派,而所著《列女传》中保留了大量的《鲁诗序》,且“视《毛序》之空衍者,尤凿凿不诬”^[4]。即使最为残缺的《齐诗》,魏源也从习《齐诗》的三国魏人张揖的《上林赋·注》中找到一个《齐诗》有序的例子:“《伐檀》,刺贤者不遇明王也。”^[5]据此魏源认为三家《诗》都有序,并且同出一源。他说:“三家遗说,凡鲁诗如此者,《韩》必同之,韩诗如此者,《鲁》必同之,《齐诗》存什一于千百,而《鲁》、《韩》必同之。苟非同出一原,安能重规叠矩?三人占,则从二人之言。谓《毛诗》不见三家古序则有之,三家乌用见《毛序》为哉?”^[6]在魏源看来,三家《诗》同源异流,诗说大同小异,《鲁》、《齐》、《韩》三家《诗》说

比《毛诗》出现要早,并且在西汉同立于学官,要说《毛诗序》不见于三家古序还可以,而三家诗序哪里用得着见于《毛诗》呢?魏源这种追本溯源的论证,颇具说服力。

其次,魏源根据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》三家《诗》的篇次、诗说、四始五际说^[9]等方面的例证,来说明三家《诗》说能够与先秦经传诸子之说相符。宋代学者郑樵说:“毛公时《左传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仪礼》未盛行,而先与之合,世人未知《毛诗》之密,故俱从三家。及诸书出而证之,诸儒得以考其异同得失,长者出而短者自废,故皆舍三家而从毛。”魏源对此进行了驳斥,他说:“《齐诗》先《采蘋》而后《草虫》,与《仪礼》合,《小雅》四始、五际,次第与乐章合。《鲁》、《韩诗》说《硕人》、《二子乘舟》、《载驰》、《黄鸟》与《左氏》合,说《抑》、《昊天有成命》与《国语》合,说《驹虞》乐官备,与《射义》合,说《凯风》、《小弁》与《孟子》合,说《出车》、《采薇》非文王伐玁狁,与《尚书大传》合,《大武》六章次第与乐章合。其不合诸书者安在?而《毛诗》动与牴牾,其合诸书者安在?”^{[10]P164}魏源认为,齐诗篇次《采蘋》在《草虫》之前,与《仪礼》用乐的诗篇次第相合,而《鲁诗》、《韩诗》所论诗旨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尚书大传》所引《诗经》之说相符,而《毛诗》之说恰恰相反,动辄与先秦典籍看牴牾,因此是三家《诗》可信的。魏源为三家《诗》的辩护,证据充分,举例精当,足与郑樵之说相抗衡。由此看来《毛诗》独兴、三家《诗》失传的原因,郑樵之说并无依据。关于《毛序》的作者问题,笔者将在后面详细加以论述。

魏源《诗古微》澄清了历代诗家对三家《诗》的歪曲认识,这一点受到清末著名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和王先谦等人的高度评价。皮锡瑞全部抄录了魏源为三家诗辩护的论说,认为“三家亡,毛传孤行,多信毛而疑三家,魏氏辨驳分明,一扫俗儒之陋”,^{[4]P118}而魏源的辩驳“可为定论”^{[4]P115}王先谦在《诗三家义集疏·序例》中也全部抄录了魏源的这些论说,并加案语说:“魏说明快,足破近儒墨守陋见,故备录之。”^{[5]P160}这足以证明魏源辩驳的学术价值。

二、魏源认为《毛序》非子夏所作

《诗序》的作者为谁,历代聚讼纷纷。通常学者将《关雎》之前的长序称为《大序》,而将《诗经》各诗篇之前论说其诗意的序,称为《小序》。东汉郑玄《诗谱》认为,“《大序》是子夏作,《小序》是子夏毛公合作,卜商意有不尽,毛更足成之”。而《后汉书》认为《毛序》为卫宏所作,“(卫)宏从曼卿受学,因作《毛诗序》,善得风雅之旨,于今传于世”。《郑谱》与《后汉书》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,成为日后《诗序》作者争端的根源所在。唐人成伯玑认为,整个《大序》为子夏所作,“其余众篇之《小序》,子夏惟裁其首句,……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诗中之意系其辞也。”^{[6]P158}成氏讨论《诗序》的作者问题,将《小序》分为首语与续申之词,认为首语为子夏作,续申之词为大毛公所作,此论影响非常深远,后代诗家探讨《诗序》的作者问题,多沿袭这一做法。

关于《诗序》的作者,魏源在《诗古微·毛诗传授考》中引用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论述《毛诗》的传授源流时,将陆玑“孔子删诗授卜商,商为之序”这句话删去,说明魏源不赞成子夏作《诗序》的说法。他说:“考《诗序》之说,不见于

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,即《毛传》亦绝无‘序’字,……至毛公为《故训传》,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。则毛公名‘义’而不名‘序’明矣。……惟《后汉书》称卫宏作《毛诗序》,善得《风》、《雅》之旨。而成伯玑因以今《序》首语、次语为别。则今《序》首语,与笙诗一例者,毛公师授之义,其下推衍附益者,卫宏所续之序明矣。”^{[3]P198}由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并没有关于《诗序》的记载,《毛传》也绝无“序”字,因此魏源对《毛序》出于子夏的说法,根本不相信,他依据《后汉书》的记载,又受成伯玑的启发,把《小序》分为两段,认为首句为毛公所作,而其下续申之词为卫宏所作,称之为“续序”或“卫序”。魏源认为,“卫序”很多时候偏离或歪曲了《毛传》、《毛序》的意思,但是历代混“卫序”于《毛序》之中,造成了后人对《毛诗》的误会与曲解,使《毛诗》的本义湮灭不彰,因此要阐明《毛诗》本旨,必须先辨正“诗序”之名。魏源否定《诗序》为子夏所作,又批评《毛序》解诗的谬误,在清代经学家中颇具批判与怀疑精神。

魏源对《毛序》作者的态度,在清代学者中颇有代表性。当时把《诗序》作者归之于子夏或者子夏、毛公合作一说的汉学家,还大有人在,如惠栋、钱大昕、段玉裁、陈奂等人。但是相当多的学者在否定《诗序》为子夏所作的同时,采取区分首语与续申之词的方法探讨《诗序》作者,最典型的是朱鹤龄、王崧、范家相、魏源等人以及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。《总目》对这一争端采取了调停的态度,认为《毛序》首语为毛公以前经师所传,以下续申之词为毛公以后弟子所附。《总目》不再坚持《诗序》为子夏所作,颇能代表官方和当时学术主流对《毛序》的态度。在攻击《毛序》的学者中,魏源是一员颇有影响力的勇将。

三、否认《毛诗》传授源流的可靠性

在《诗古微》初刻本中,魏源认为三家《诗》与《毛诗》同出于西汉,而且都是荀子所传,但是对各家传授源流并没有进行具体考证。而在《诗古微》二刻本中,魏源详细探讨了鲁、齐、韩、毛诗的传授源流。关于《鲁诗》,魏源认为传自申公,而申公“受《诗》于浮丘伯。伯者,孙卿门人也”。^{[3]P198}因此《鲁诗》为荀子所传。《齐诗》传自齐人轅固生,而轅固生师从何人,史无明文,魏源也没有考证。关于《韩诗》,魏源依据《唐书》“《韩诗》卜商序”的话,认为出自子夏。

关于《毛诗》传授源流的记载,主要是三国时吴人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和唐代陆德明的《经典释文》。在《诗古微·毛诗传授考》中,魏源开篇就引用了《经典释文》和《陆疏》中关于《毛诗》传授源流的记载:“《经典释文》引徐整云:三国吴人子夏授高行子,高行子授薛仓子,薛仓子授帛妙子,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。大毛公为《诗故训传》于家,以授赵人小毛公。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。一云,此见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。亦三国吴人。子夏授曾申,曾申传魏人李克,李克传鲁人孟仲子,孟仲子传根牟子,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,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。”^{[3]P121}魏源发现陆玑与陆德明的说法,有互相矛盾之处:“夫同一《毛诗》传授源流,而姓名无一同。且一以为出荀卿,一以为不出荀卿;一以为河间人,一以为鲁人,展转傅会,安所据依?岂非《汉书》‘自言子夏所传’一语,已发其覆乎?以视三家源流,孰传信?孰传

疑?”^{[3][P121]}这足以说明《毛诗》传授源流的不可靠。他们二人的说法源于徐整和陆玑,魏源在夹注中指出,徐整和陆玑都是三国吴人,旨在说明汉代并没有《毛诗》传授的详细记载,直到三国时期的吴国,才出现了《毛诗》传授情况的详细记载。对《汉书》“又有毛公之学,自言子夏所传”的记载,魏源认为“自言”一词,说明班固对《毛诗》的传授源流采取存疑态度。根据以上史料,魏源认为《毛诗》的传授源流是大大有问题的。

据笔者考察,《毛诗》的传授源流,见诸文献记载较三家《诗》为晚,《史记·儒林传》只提到三家《诗》,而没有涉及到《毛诗》,说明当时《毛诗》的影响比较小。《汉书》开始记载《毛诗》出自赵人毛公,但是并没有毛公之名。《艺文志》说:“又有毛公之学,自谓子夏所传,而河间献王好之,未得立。”《儒林传》:“毛公,赵人也。治诗,为河间献王博士。”从班固的记载中可以看出,东汉时毛公的具体情况已模糊不清,甚至连姓名也不为世人所知。对于《毛诗》是否出于子夏,班固也不敢确信,出于谨慎起见而云“自谓子夏所传”。直到东汉末郑玄《诗谱》才开始有大、小毛公之别,“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,河间献王得而献之,以小毛公为博士”。三国时吴人陆玑《毛诗草木鸟虫鱼疏》指出大、小毛公的姓名:“毛亨作《诂训传》,以授赵国毛萁,时人谓亨为大毛公,萁为小毛公。”可见随着时代的推移,《毛诗》日益受到社会和学界的重视,关于毛公的记载也就越来越详细,显然这是后代学者的附会。对此,皮锡瑞曾说:“《史记》不及毛公,若毛公为六国时人,所著有《毛诗故训传》,史公无缘不知,此《毛传》不可信者一。”^{[4][P19]}“又郑君始言大小毛公有二,陆玑始著大小毛公之名。……郑,汉末人,不应所闻详于刘(歆)班(固),陆玑,吴人,不应所闻又详于郑。”^{[5][P19]}因此,《毛诗》的来历确实令人难以置信,魏源的论证相当有见地。

在《诗经》研究上,魏源力主三家《诗》已为学术界所公认,也非常切合魏源本人的学术思想,但并非像梁启超所说,魏源认为《毛传》全是作伪。魏源对《毛诗》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传授源流与《毛序》非子夏所作,纵观《诗古微》全书,几乎找不到魏源攻击《毛传》之处,更不用说“全是伪作”。

四、魏源对三家《诗》的批评

对于三家诗,魏源虽痛惜其衰亡,赞赏其“以三百篇当谏书”的通经致用精神,但是他仍能以公允的态度,看到三家《诗》的缺点:“三家本经既亡,可见者惟诸子传说所称引,或偏而不全,驳而失实,则多闻缺疑者,固不可不知所择矣。义之同者既条列于前,至其所异之义,则有沿讹而失其真,与夫疑义而当缺,错谬而难信者;有支文旁义,虽出《鲁》、《韩》而实不如《毛》者。苟不明辨之,将为穿凿诬枉者之藉口,所关匪细也。”^{[3][P75]}魏源在此指出三家《诗》存在的种种问题,如三家《诗》有“沿讹而失其真,错谬而难信”者;有“《鲁》、《韩》支文旁义不如《毛》”者。魏源对三家《诗》虽然推崇,但并不因此而讳言其短,表现了一位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。

在西汉,儒生喜欢用阴阳灾异说经,当时齐、鲁、韩三家《诗》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阴阳五行化的倾向。例如,三家《诗》说解《大雅·生民》,认为周先祖后稷是姜嫄履巨人脚印而

生,说解《商颂·玄鸟》,认为商先祖契是简狄吞玄鸟卵而生。郑玄、孔颖达、朱熹皆采此说。而《毛诗》说解《生民》、《玄鸟》,不信神奇怪诞,而是实事求是,就诗立说,与三家《诗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如《毛传》说解《生民》“履帝武敏歆”的意思是,姜嫄去祭祀,跟在其夫高辛帝的后面,踩着他的足迹,踏出敏捷的步伐,去向上天祭飨。《毛传》解说《玄鸟》“天命玄鸟,降而生商”时说,在春天燕子初来的季节,简狄跟随高辛帝去郊谋祈子而后生契。魏源虽主三家《诗》,但对于《毛诗》说解《生民》、《玄鸟》却非常赞赏。在《诗古微》初刻本《毛诗明义五》中,他对“后稷始生见弃之由”、“郊谋世系之误”进行了辨说,最后总结道:“稷生巨迹,出于虚诞之《列子》,貤貽简狄,出于荒唐之《天问》。……而二说独流传于世,三家《诗》皆信之,至谓圣人皆无父,感天而生。《诗疏》引许慎《五经异义》,史迁用《鲁诗》说著之《史记》,而郑氏又益以纬书感生帝之说。若然,则孰谓夫子不语怪乎?吾故以经注经,明其始生见弃之由,与夫郊谋世系之误,以窃申《毛诗》之正义,用告夫《索隐》怪语而后世犹述之者。”^{[3][P75]}在此,魏源批评了三家《诗》“圣人无父、感天而生”的讖纬之说,非常赞赏《毛诗》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态度。

《诗古微》一书中,魏源对郑玄批评甚多,但对《郑笺》有些错误源自三家《诗》也毫不隐讳:“人知《郑笺》多与《毛》异,而不知实用《鲁》、《韩》。如‘好仇’之训,则本《鲁诗》,《羔羊》之减退膳食,率从公道,则本《韩诗》;《生民》之履敏载歆,则本三家诗。然皆逊《毛》之从顺。故曰有实不及《毛》者此也。”^{[3][P654]}在魏源看来,郑玄因采用三家《诗》说而导致《郑笺》之说与《毛诗》有异,甚至不如《毛诗》意义顺从,这说明三家《诗》也存在诸多不如《毛诗》之处。

但魏源的思想前后有所变化,《诗古微》二刻本中,对于《生民》和《玄鸟》的说解,又弃《毛传》而从三家诗说。对于记载“稷生巨迹”的《列子》,“貤貽简狄”的《天问》,魏源不再认为其书虚诞和荒唐,而是成了郑玄所祖三家诗说古义的“周秦古籍”,“固胜《毛诗》望文为说矣”^{[3][P659]}。魏源对此解释说:“《五经异义》云:《诗疏》。《诗》齐、鲁、韩及《公羊》说;‘圣人皆无父,感天而生’者,即‘维岳降神’天授,非人力之谓,以绝末世暗于天位之心。故褚先生述之,谓《诗》言契、稷无父而生。案,诸传记咸言有父,《诗》言生于卵迹,欲见有天命精诚之意耳。鬼神不能自成,须人而生,奈何无父乎?至纬书益以感生帝灵威仰之云,始近语怪。吾复原礼制,推祯祥,正世系,以申三家之本义盖如此。”^{[3][P110]}由此可见,魏源对《生民》、《玄鸟》的说解弃毛而从三家,并非他相信“圣人无父”,因为三家《诗》认为“圣人无父”的本义,在于杜绝末世乱臣贼子对帝位的窥伺,这正是三家《诗》的微言大义所在。他对《毛诗》与三家《诗》或从或舍,在于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思想是否“精微”,而非出于门户之见。

五、魏源论《毛诗》与三家《诗》的关系

魏源论《毛诗》与三家《诗》的关系说:“于是而《毛》与三家会通之故可得而言也。夫三家之于《毛》,犹《左氏》、《公羊》之于《谷梁》,或《毛》所未备而三家补之,或小异而大同,或各义不妨两存,在善读者引申而已。”^{[3][P120]}在魏源看来,三家《诗》与《毛诗》小异而大同,或者可以补充《毛诗》,或者可

以各义并存,“皆《毛诗》之益友”。^{[1][P120]}在二刻本中,随着魏源对《诗经》研究的深化,他对《毛诗》的批评也更加精当而深刻,但认为三家《诗》是《毛诗》益友的观点并没有改变。同时魏源也批评了在《毛诗》与三家《诗》关系问题上存在的两种错误观点:“自私者各以己意主奴之,好新薄旧,则三家片语必胜于二毛,若范家相《三家拾遗》。附盛挤衰,则谓三家之亡尚恨其不早。若姜炳章《诗序补义》。知其人从善服义之公心,必大异于古人也。”^{[1][P114]}这里,魏源既批评了三家《诗》只言片语都胜过《毛诗》的看法,也批评了古文家认为三家《诗》早该灭亡的观点。

既然居于经学统治地位的《毛诗》存在诸多问题,而千年湮没无闻的三家《诗》又有诸多可取之处,那么应如何处理《毛诗》与三家《诗》的关系呢?魏源说:“以汉人分立博士之制,则《毛诗》自不可废,当以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》与《毛》并行,颁诸学宫,是所望主持功令者。”^{[1][P890]}在古文经学定于一尊的情况下,魏源却说三家《诗》为《毛诗》的“益友”,要求“主持功令者”允许三家《诗》与《毛诗》平起平坐,“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》与《毛》并行,颁诸学宫”,实质上是要求取消《毛诗》在经学领域的独尊地位。清代疑古思潮的推演,今文经学的大放异彩,与魏源今文经学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。

总之,魏源对《毛诗》与三家《诗》采取客观的说经态度,张大三家《诗》的旗帜而不护其短,批评《毛诗》而又能见其长,这种治学精神非常难能可贵。他认为三家《诗》是《毛诗》

的益友,在《毛诗》与三家《诗》的关系问题上没有门户之见。看来梁启超认为魏源主三家诗并没有错误,但说魏源排斥《毛诗》不遗余力、认为《毛传》全是作伪则失之片面。

注释:

①四始五际说多源于《诗经》纬书,“四始”指诗经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、《周颂》四部分的第一首诗即首章,他们分别是《关雎》、《鹿鸣》、《文王》、《清庙》,经学家认为这是孔子特意安排的,自有精深的微言大义隐寓其中。“五际”说把天人合一的阴阳五行思想与《诗经》的篇目糅合起来,借以说明社会政治变革的规律或趋势。所谓“际”是指世运(或社会政治)发生变革的时刻,“五际”顺次轮回,就是社会政治发展变化的规律。亥、卯、午、酉、戌是革命或变革的时刻,而与之相对应的《大明》、《天保》、《采芣》、《祈父》、《十月之交》五首诗则分别代表着革命或变革的意义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梁启超.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.
- [2]梁启超.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[M].北京:东方出版社,1996.
- [3]魏源.诗古微[M].长沙:岳麓书社,1989.
- [4]皮锡瑞.经学通论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4.
- [5]王先谦.诗三家义集疏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7.
- [6]洪湛侯.诗经学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2.

(上接第104页)的生态影响。

注释:

①东晋诗人评诗作诗,都突出一个“致”字。“致”指一种近于意理的东西,但又不像通常的理语那样明确地表达意思,而是带点朦胧色彩,往往是事中含理,象中含理,这样一种表达特质,东晋诗人称为“致”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王国维校.水经校注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4.
- [2]逯钦立辑校.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- [3]严可均编.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4]房玄龄等撰.晋书(卷六十二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- [5]刘义庆著.刘孝标注.曲建文,陈桦译注.世说新语译注[M].北京:燕山出版社,1998.

[6]罗宗强.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6.

[7]王国维.王国维文集(第一卷)[M].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1997.

[8]施韦兹.敬畏生命[M]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83.

[9]刘义庆撰.余嘉锡笺疏.世说新语笺疏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.

[10]胡应麟.诗数(外篇卷二)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58.

[11]郭绍虞.中国历代文论选(第一册)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.

[12]宗白华.艺境[M].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0.

[13]胡晓明.万川之月: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[M].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92.